

广东党史资料

第三十五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党史资料

第三十五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坤仪

责任技编：黎碧霞

广东党史资料

第三十五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厂址：广州市西湖路 51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125 印张 34 万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8-03616-3/K·797

定价：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纪念建党 80 周年

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史研究综述	田子渝 (1)
---------------------	---------

历史回顾

粤北怀旧	于光远 (13)
大北山革命根据地	贝 浩 (31)
我是怎样转变过来的	蓝举初 (55)
东江纵队政治部政工队的往事	陈海仪 (102)

专题史料

方方地方主义问题平反经过	陈遐瓚 (111)
解放战争时期广州学校系统中共基层组织概况 ...	曹 直 (150)

改革开放专题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广东农业的拨乱反正	何文辉 (169)
治理整顿方针在广东的贯彻	杨 建 (193)

清远经验的形成推广与县级工业经济体制改革 ...	刘仲强 (208)
惠阳市 20 年来建设成就综述	黄县堂 (219)
新时期惠州经济发展与思想解放刍论 ...	零建洲 彭长明 (232)
肇庆公路建设对山区经济发展的作用	赵志能 (244)

学术探讨

张闻天从“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的原因探析 ...	林雄辉 (252)
略论侵粤日军对广东经济的破坏、掠夺	官丽珍 (261)
试论邓演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	张秀玉 (284)
浅析兴梅土改运动的是与非	张 坚 (302)
东江革命根据地财政金融业研究	欧大军 (310)
珠江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概况及简评	卢继纲 (326)
解放头三年广州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肖燕明 (334)
论邓小平的侨务思想	卢 荻 (344)
海外潮人与汕头教育	陈植枫 郑艳丽 (361)
陈济棠据粤的由来与“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的缘起	连浩鏊 (378)

党史人物

谢育才传略	郑学秋 范华龄 何展琼 (421)
深切怀念李光中	容 辛 李次岩 陈柏坚 刘 军 曹汉生 (431)

史实考证

- 究竟是谁介绍马林去会晤孙中山 陶季邑 (458)
- 中共象山特别支部质疑 卢国秋 (461)
- 《广东党史资料》第24辑至第35辑分类总目录 (466)

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史研究综述

田子渝

80年前在中国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地出现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后来被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根据已有的资料显示，最早记载它们活动的是1921年共产国际的有关文献。1921年初，中共早期组织派张太雷往伊尔库茨克后，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报告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6月他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时，提交的书面报告，与瞿秋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等文件均汇报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随后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蔡和森，1926年）、《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述》（瞿秋白，1929年）、《党史报告》（李立三，1930年）等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有关党史资料中，均有论述。在延安时期，党史工作者开始将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置入党史教材和教学的视野中，但直到全国解放时，党史界对本专题研究还处在幼稚阶段，即无专人从事研究，也无实质性的成果。

建国后，本专题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6年。这一阶段可谓是起步阶段，主要有二方面的成果。一是许多亲历者，如董必武、李达、包惠僧、施存统、陈望道、沈雁冰等人的回忆资料，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本专题的内容，但其中绝大多数没有公开发表，只供少数党史机构和“一

大”纪念馆等革命文物单位参考。具有重要意义的是 1957 年苏共中央将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一批档案交给中共中央，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其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小组》等四份俄文资料，特别是后三份是本专题的直接文献，即使在今天也是最具权威的史料。此外从 1954 年开始到“文革”前，与本专题有关的《新青年》、《星期评论》、《共产党》等报刊的影印发行，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样就使一般研究者能够轻而易举地查阅。这一时期在海外令人瞩目的是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被发掘。这份资料是作者于 1924 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的毕业论文，1960 年在美国出版。该论文由于是在中共建党仅两年半之后撰写的，因此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提供了中国共产主义最初运动的重要史实。

另一方面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但缺乏专著，而在一般中共党史和建党书籍上反映。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 30 年》（人民出版社，1951 年版）是建国后探索这个问题的起点，也规定了本专题的研究方向。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 年版）、李新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 年版）和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 年版）等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和教材，虽是胡模式的延伸，其特点是突出毛泽东的建党活动，但有创新，特别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在“文革”十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学术界遭到文化专制的摧残，根本没有正常的学术活动，因此无法说成是一个阶段。难能可贵的是 1971 年 8 月 4 日，董必武专门谈中国共产

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一时期在海外令人注意的是张国焘的《我的回忆》（1966年）和《中国共产党的兴起》（1977年）的出版，尽管至今海内外研究者对这两本书的看法不一，但它们提供了许多中共党史重大事件的资料则是大家的共识，其中留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共“一大”的一些不为人所知晓的若干细节。

从60年代开始，前苏联学者为了配合苏共中央的对华总战略，在中共建党时期研究产生了一批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成果，其中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奋斗》（M. 加鲁夏仙茨，《亚非人民》1961年第3期）、《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1920—1927年）》（B.N. 格鲁宁，载于《共产国际与东方》，莫斯科，1969）、《一篇历史文献——张太雷准备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稿》（M.A. 佩尔西茨，《亚非人民》1971年第4期）、《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援助》（A.N. 卡尔图诺娃，《远东问题》1973年第1期）等。其特点是强调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与中共全国性组织的建立是共产国际领导的结果。

第二阶段从1976年到2000年。这一阶段本课题可谓硕果累累。进入了成熟期。首先关于共产主义小组的资料被系统的整理，这方面最突出的成果是《共产主义小组》（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的出版。该书是国内外最璀璨夺目的一部共产主义小组的资料汇编，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记录本专题全貌的书籍。全书975页，82万字，分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旅日、旅法等8个共产主义小组部分，每部分包括综述、文献和报刊资料、回忆录等。综述反映了当代党史工作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尽管有些观点不一定为所有研究者所认同，但它无疑

成为本专题进行新研究的首选资料。《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知识出版社，1988年）则以更翔实的史料充实了《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内容。

随着改革大潮的勃兴，我国学术界与海外学术交流日益广泛，国外有关资料和研究成果陆续被介绍进来，更加充实了本专题的研究。最有价值的当属《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一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里面关于中共“一大”前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代表的信件具有极高的价值，彻底改变了一些传统的说法，在没有发现这些资料之前，国内历史学家基本上是依据回忆录展开研究，现在使这段历史有了可靠的文字依据，将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其次展开多方面的科研活动，有力地促进本专题的进展。改革开放也迎来了我国学术的春天，围绕五四运动和中共诞辰纪念日，国内举行的各种学术研讨会上，均有与本专题有关的论文。特别是1979年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党史界（现代史界）为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组织队伍对五四运动一建党展开大规模的资料收集、整理，产生了一批与此有关的地方史志成果，如五四运动与北京、广东、上海、武汉、重庆、山东等资料性的书籍出版，均涉及到本专题，为深入研究奠定了扎实的文字基础。1984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组织了上海、北京、湖北省、湖南省、山东省、广东省等六省市的党史资料征集部门和史学界的力量，布置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之一《共产主义小组》的编研任务，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于1987年面世。在共产主义小组诞生80周年之际，在上海举行了“共产主义小组与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学术研讨会”，这是至今唯一以共产主义小组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即是对本课题的总结，也是研究的新起点。

最后研究全面展开，通过学术争鸣力求还原历史。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许多新资料的被发掘和思想解放，研究者本着求实存真的精神，重新审视了以往的研究成果，几乎所有的传统定论都遇到了挑战。有些问题取得了共识，如在中共“一大”前在上海、北京等地已经产生了党的早期组织，它们的主要活动：组织青年团，在学生、工人中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组织，筹备召开中共“一大”等。有些问题还在探索，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党早期组织的名称

最先提出中共早期组织不叫共产主义小组的是那些幸存的当事者，现在研究者都已知道共产主义小组不是中共早期组织的本名，而是后人使用的名称。有人指出党的早期组织的名称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共上海发起组一开始叫“社会共产党”。其根据有二，一个是该组织第一批成员的俞秀松在1920年7月10日的日记，称这个组织为“社会共产党”。另一个是陈独秀于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期发表的《对于时局的我见》称“吾党”为“社会党”。后来陈独秀接受了李大钊的意见，将其改称“中国共产党”，11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月刊是最有力的证明。随后在北京、武汉、广州等地相继出现了地方党的组织，其名称有各种说法。

1920年8月17日，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外国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致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称，在

上海成立了一个“革命局”，并在北京也成立了同一组织，随后在广州、汉口各成立了一个局^①。对“革命局”的机构不容怀疑，问题是它与中共上海发起组是一个什么关系。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杨奎松在《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认为“革命局”的出现与维经斯基的使命紧密相关。维氏根据俄共在远东的战略意图，到中国来的目的就是通过与各革命组织取得联系，建立共产党。为此在他的安排下，1920年7月19日，上海召集了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大会，产生了“社会主义者同盟”，随后派生出上海“革命局”，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共上海发起组。

金立人在《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若干史实考》（《党的文献》1997年第6期，1988年第1期），考证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于1920年6月，与上海“革命局”不是一码事。“革命局”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随着这个同盟的解散，该机构当然随之消失。“革命局”的出现，是陈独秀和维经斯基存在不同建党实践和思路的结果。

那么中共党史何时提出共产主义小组，以及今天是否还应该沿用这个名称？曹仲彬发表的《对“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质疑》（《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等文章观点鲜明，对论证这个问题作出了挑战性的贡献。文章认为最早提出“共产主义小组”概念的是列宁和共产国际。1919年3月在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就有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列席。以后共

^①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一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5页。

产国际代表就将这个名称套用到中共早期组织上。1936 年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英勇奋斗十五年》将中共的早期组织冠上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同一年陈潭秋撰写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共产国际》第 7 卷第 4、5 合刊，1936 年 6 月）中使用了这个概念，至此“共产主义小组”名称开始在党内传播，沿用至今。曹文强调“共产主义小组”是个名不副实的名称，因为它既不是历史名称，又不能真实地反映党早期组织的性质。

关于第一个问题，曹文至少有两点说得不准确，在中共党内、共产主义小组的称谓不是始于陈潭秋，而在 1921 年张太雷和瞿秋白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已明确地使用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个概念。此外这个名称开始在党内传播也不是在陈潭秋的文章后，而是建国后。关于后一个问题，则是一个仁智相见的问题。李樾在《共产主义小组概述》（《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年）一文提出自己的看法：“有一种意见认为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是不确切的，主张改为“党的早期组织”，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叫做“党的发起组”。我们认为，“党的早期组织”、“党的发起组”等等也不是当时的名称，而且涵义也不尽准确；共产主义小组已经沿用了 50 多年，为广大党员群众所接受，所以没有必要改变。重要的是应该正确认识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对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到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要有完整的、统一的理解。”

(二) 在中共“一大”前是否存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 (简称湖南小组)，是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由于它与毛泽东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意义就不言自明，因此“文革”结束前已成定论。1959年中共湖南省委决定新修的《湖南省志》第一卷出版，上面明确地写道：“1920年秋，继上海、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之后，毛泽东同志在长沙组织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国革命史讲义》等更进一步认定小组成立于1920年9月。80年代胡庆云、肖姓对这个定论提出了质疑。他们发表的《关于湖南共产主义小组问题的商榷》（《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认为在中共“一大”前不存在着这个组织，主要理由三点，第一，从毛泽东在“一大”前的革命活动来看，湖南没有共产主义小组。文章对毛泽东在中共“一大”前活动进行排列分析，认为虽然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充分证明在湖南建党的基础已经存在，但没有资料证明这个小组存在。第二，从历史文献来考察，“一大”前湖南没有共产主义小组。文章主要考察《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和《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至于与湖南小组有关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马林1922年7月1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作者作了不能令人信服的推测。第三，从早期在湖南和毛泽东一起战斗过的同志的回忆来考察，“一大”前湖南没有共产主义小组。这方面最有力量的资料是新民学会的骨干分子易礼容的回忆材料。易是湖南最早成立的党组织的三名成员之一，其说法当然具有权威性。易证实中共“一大”前，根本没有共产主义小组，湖南建党是在中共“一大”以后的事。他的这种说法从李达

的回忆中也得到印证。《伟大的开端》回避了这个问题，只有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情况。

有些文章则与胡、肖文的结论相反，《共产主义小组》一书中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综述》正面论证了这个问题。这篇由唐振南执笔的综述，有意思的是对湖南小组的成立时间却十分含糊。^① 为了支撑在中共“一大”前存在湖南小组的结论，综述引用了当事人毛泽东的四份资料，即1945年4月21日的《七大工作方针》、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代表证上亲笔填写的入党时间、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的谈话和1969年4月1日他在中共“九大”开幕式上关于中共“一大”的讲话。可惜其中三份不能支持唐文的结论。第一份资料毛泽东只是泛指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一样，先有小组后发展成党的，并没有明确说湖南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第二份资料毛泽东讲的是自己入党的时间（1920年），与湖南小组无关。第四份资料毛泽东列举中共“一大”的是“湖南的代表”的名单，不是“湖南小组的代表”的名单，唐文偷换了概念。看来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三）关于广州共产主义小组

在90年代中期以前，国内研究者主要依据陈公博起草的《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进行研究，但由于对这份资料在理解上的

^① 唐振南在1988年发表的《关于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若干问题》（《毛泽东思想研究》1988年第3期）上，将湖南小组成立的时间定在11月底，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确定的日期保持了一致。

差异和看问题角度，对广州建党的时间有“1920年成立说”和“1921年成立说”两种意见。1987年出版的《共产主义小组》收入了由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撰写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综述》，可视为是该专题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它对以上两种说法的处理方法较为慎重，体现了史学工作者严谨求实的态度。对陈独秀等共产主义者在广州建党作了详细的介绍，广州建党的最大特点是先有青年团，后建党。1920年成立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陈独秀与谭平山等于1921年春组建了“真正的共产党”。对于苏俄代表于1920年下半年与无政府主义者成立的“共产党”，综述也作了说明，“与其称为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和1993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广州市组织史资料》采取了“1921年成立说”。

1997年中文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资料出版后，其中有资料涉及到广州早期建党，这将有利于研究者对这个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曹直《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广州地方早期组织的创建》（上篇发表在《广州党史》2000年第2期）是这方面的最新成果。笔者认为中共广州党的创建实际上也存在两条线，一条是陈独秀等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另一条是苏俄来华代表维经斯基等。1920年9月，斯托扬诺维奇（化名米诺尔）及其助手别斯林奉维经斯基指示抵达羊城，他们与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取得联系，并成立广州“革命局”（共有成员9人，除苏俄代表2人外，其余均为无政府主义者），这绝不是他们不了解广州情况所致，更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体现了维经斯基在以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联合的基础上建立中国共产党思路的结果。广州没有“社会主义者同盟”，因为广州“革命局”是苏俄

代表领导下的一个机构。它与谭平山等广州第一代共产主义者成立的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几乎同时产生，彼此又没有来往正说明了陈独秀等与维经斯基存在两种建党实践和思路。1921年年底陈独秀、维经斯基来到广州，他们与无政府主义者讨论建党，由于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了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建党的原则，于是陈独秀、维经斯基便在建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其具体体现：在北方（以广州而言，包括上海、北京），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彻底决裂；在广州陈独秀等成立了将无政府主义者排除在外的共产主义小组。

（四）关于中共旅法小组

共产主义小组中包不包括旅法小组，或者说中共“一大”前存在不存在这个小组，对此学术界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有，王永祥的《关于中共旅法小组和旅欧支部》（《史学月刊》1983年第3期）较为集中的申诉了理由：首先旅法的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人在1921年春夏，即中共“一大”前，在要不要建立一个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问题上，已经相继得出相同的肯定的结论，为开始酝酿建立共产党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其次根据有关资料，从1920年末到1921年春，在旅法华人中已开始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最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申府于1920年底抵达巴黎，先发展了刘清扬入党，于1921年3月与刘介绍周恩来入党（1922年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周入党）。1921年3月，在国内已入党的赵世炎经陈独秀的书面介绍，到达巴黎与张申府接上组织关系，这样中共旅法小组（也可称中共巴黎小组）便成立了。《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